

器物展览与文献展览 比较研究 *

周婧景 马梦媛

内容提要 自博物馆诞生之初，器物 and 文献便同时被纳入展览收藏体系，直至图书馆、档案馆和方志馆等机构展览业务勃兴，文献展览才作为一种现象级展览获关注。但图书馆等机构的展览，更多的是主张与博物馆合作，或者干脆效仿博物馆器物展览之策展理念和方法。事实上，器物展览和文献展览属于两种常见的形态。本文在界定两类展览相关概念、探索两者历史渊源的基础上，提出器物展览和文献展览在信息的特征与载体的类别上存在本质差异。因此基于两类展品所策划的展览，应当具备两套不同的策展理念和阐释模式，差异在于是否需要进行信息重构。鉴此，在探索展览专业化的过程中，不可一味专注于方法论上的问题，而是需要先讨论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问题，弄清展览自身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坚持差异性前提下的方法论研究。

关键词 器物展览 文献展览 信息重构 展览专业化

一 问题提出

我们早已习惯于“借助能被识别的语词符号”来传播信息，从而实现人类基于这类传播方式的间接学习，但事实上除了这类屡见不鲜的传统方式外，人类还可以拥有一类自成一格的传播方式，即“通过能被感知的实物”。近年来，由于传播媒介技术的不断推层出新，如从APP到云计算，从虚拟现实到增强现实，以及电子现金系统横空出世，我们生活的周遭似乎正在加速化为虚无，但我们置身其中的现实世界却一如既往地是由琳琅满目的有形物质所形构。2010年前后，文化研究领域开始系统地探讨“物质性转向”(Materialism Turn)或“物质转向”(Material Turn)议题，该议题犹如一道冲破传播研究盲区的亮光^①，借助“物”进行信息传播的理念和做法，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

其中，物质遗存作为自然变迁与人类活动的创造物，尤为令人瞩目。正如塔米·戈登(Tammy S.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6CTQ001)部分成果之一；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课题(2018EKS005)部分成果之一。

① Murdock G, "Media Materialities: for a moral economy of machine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8, 68(2): 359-368; 章戈浩、张磊：《物是人非与睹物思人：媒体与文化分析的物质性转向》，《全球传媒学刊》2019年第2期，页103—115。

Gordon) 对《博物馆还需要实物吗》一文的评论：尽管博物馆角色不断发生变迁，实物一直是博物馆的本质特征。围绕博物馆的物开展研究的学者主要有鹤田总一郎(Ichiro Tsuruta)、格鲁金斯基(Serge Gruzinski)、冯·门施(Van Mensch)、雷恩·梅兰达(Lynn Maranda)、苏珊·皮尔斯(Susan M. Pearce)、迈克尔·罗兰(Michael Rowlands)、苏东海等。尽管这种遗存具有碎片化和不均质等缺陷，但它们却是真实信息的片段再现。其所载信息不同于报纸、电视和网络等普通信息，在原载体上，真实且唯一，由此成为重构古代自然、社会或文明的有力“物证”^①。博物馆展览之所以存在，说到底就是为借助这些物证及其所载信息，为公众创建一个有别于真实世界的另一客观世界。

但遗憾的是，在博物馆领域，“物证”通常被简单地窄化为“地层、标本、文化层、文物，甚至是普通物件”，而忽视了由人类文明传世至今的另一类“物证”——文献，如图书、谱录、奏稿档案、经卷等。这两类物证无论是外在特征，还是内在属性，均存在本质差异。但长期以来，展览领域一直将两者混为一谈，致使两类展览无论是在策展理念，还是阐释模式上都较为趋同，我们也很少将两者进行明确区分，并加以深入探究。由此，间接地造成了两类“物证”，尤其是后者价值的弱化和资源的浪费。

究其因，可能在于我国博物馆较为重视展览的开发、策划、设计、制作、布展和评估等表层经验和内在逻辑方面的应用理论研究，但是对于展览的概念廓清、历史爬梳、类型划分等方面的基础理论研究，始终“不以为意”。殊不知，探讨“怎么办”这一“方法论”层面的问题固然极为重要，但弄清楚“是什么”这“本体论”层面的问题，以及“为什么”这“认识论”层面的问题，乃是深入探究“怎么办”的逻辑起点。所以，本文将尝试聚焦于展览类型学问题，将当前展览中较为极端的两种展览类型——器物展览和文献展览区分出来。虽然目前展览中，还存在一种夹杂器物 and 文献的混合类型，但为了致力于探寻两类展览的差异，本文将仅围绕器物展览和文献展览两种类型，针对其属性、理念、模式等方面展开比较研究，重点探讨其中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并简要论及怎么做。

二 器物展览与文献展览相混淆的历史渊源

尽管在过去的半个世纪，博物馆在藏品的收藏、保管、展示和教育活动上所取得的成绩一日千里，但下个世纪的博物馆，很可能会与今天所呈现的模样大相径庭。然而有一点可能永远不会改变，即“展览”始终会是博物馆身份构建的基础。近年来，由于展览的数量激增、理念更新和元素丰富，展览及其相关研究趋热。以数量为例，2017—2019年三年间，2017年陈列展览约达2万个^②；2018年约达2.6万个，增

① 周婧景：《被忽视的“物证”：博物馆学视角下的文献收藏机构展览刍议》，《自然科学博物馆研究》2020年第2期，页31。

② 中国经济网：《国家文物局：40年来我国博物馆数量增长了14倍》，网络地址为：http://www.ce.cn/culture/gd/201811/24/t20181124_30859335.shtml。访问时间以本文首次发表日期为准，下同。

长了30%^①；2019年约达2.86万个，增长了10%^②；可见三年间展览数量急剧攀升，增幅高达43%。一批有关如何策展的高质量论著相继问世。正如前文所言，探讨策展方法论虽然尤其重要，但在解决该问题前，首先要解决的是展览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厘清展览的内涵并进行分类，然后依据科学认识论回答各个层面的为什么。鉴于此，下文我们将根据展品构成的不同，将展览主要分为器物展览和文献展览两类，尔后从与主题相关的概念界定、两类展览的并存与合作，以及文献展览专业化研究失衡三方面，来追溯器物展览和文献展览——这两种存在各自特殊性的展览类型，长期招致混淆的历史渊源。

（一）展览、器物展览和文献展览的概念界定

在英文世界里，展览与三个术语“Display”“Exhibit”和“Exhibition”有关。一般来说，“Display”是指不进行重要解释，而向公众展示的物品^③；“Exhibit”是指将局部实物和解释材料组成一个紧密结合的单元^④；“Exhibition”是指将所有元素（包括Display和Exhibit）全面组合，以构成提供公众使用的完整的藏品和信息的公开展示^⑤。或被定义成展示、陈列材料，使之与观众进行沟通交流^⑥。它既可指展示行为的结果，也可指展示内容与展示地点的整体^⑦。相较于这些定义，国内有关学者对展览概念的界定，显得更加全面而严谨。王宏钧认为，“展览”是指“在特定空间内，由具备艺术、历史、科学与技术性质的物件所构成的展示，其通常按照一定主题、序列和艺术形式加以组合，是进行直观教育和信息传播的展品群体”^⑧。严建强提出，“展览”是指“在一系列时间、空间或内容上具有相关性的藏品中提炼出主题，然后根据这个主题对它们进行符合认识论和审美要求的有机组合，构成一个能反映自然生活或社会生活某些事实、现象和规律的形象体系”^⑨。陆建松指出，“陈列展览”是指“在特定空间内，以文物标本和学术研究成果为基础，以艺术的或技术的辅助展品为辅助，以展示设备为平台，依据特定传播或教育目的，使用特殊的诠释方法和学习次序，按照一定的展览主题、结构、内容和艺术形式组成的，进行观点和思想、知识和信息、价

① 中国经济网：《国家文物局：截止2018年底全国博物馆数量已达5354家》，网络地址为：http://www.ce.cn/culture/gd/201905/18/t20190518_32117260.shtml。

② 中国政府网：《2019年我国博物馆接待观众12.27亿人次》，网络地址为：http://www.gov.cn/xinwen/2020-05/18/content_5512680.htm。

③ Dean D, *Museum Exhibi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p.3.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美]玛格丽特·霍尔（环球启达翻译咨询有限公司译）：《展览论：博物馆展览的21个问题》页24，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此处陈述借鉴了该书对米沙·布莱克《展览设计1950》的转引。

⑦ 安德烈·德瓦雷，方瓦斯·梅黑斯主编（张婉真译）：《博物馆学关键概念》页27—29，Armand Colin出版社，2010年。

⑧ 王宏钧：《中国博物馆学基础》页246，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美]乔治·埃里斯·博寇（张云、曹志建、吴瑜、王睿译）：《新博物馆学手册（第三版）》页129—165，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⑨ 严建强：《博物馆的理论与实践》页224，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

值与情感传播的直观生动的陈列艺术形象序列”^①。可见，三位学者的观点不再止步于对展览现象的笼统描述，还涉及到展览的科学组织及其具体目的。无论如何，笔者认为展览主要是以物、相关现象及其表达方式作为主要沟通渠道，通常具备三大特征，即依托物、主要借助视觉传播且属于一种形象体系。其中，器物展览中的“物”指向的是器物，器物既可以作为展览的展示对象，也可作为展览的展示材料。而文献展览中的“物”指向的是文献，在这类展览中文献应主要作为展览的展示材料。

（二）器物展览和文献展览的并存与合作

从纵向的历史逻辑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上述两类展览很长一段时间并未被有意识地加以区分，直到图书馆、档案馆和方志馆等文献收藏机构推出展览。最早可追溯到18世纪50年代的英国不列颠图书馆，业界才逐步意识到文献展览的客观存在。学界在展览实践的基础上，主要围绕展览的内涵外延、历史、功能、发展策略、案例剖析、网上展览等方面展开研究。但诸多研究中，很少有将文献展览作为一种独立类型，与其他类型的展览进行深入比较。这可能与展览诞生之初，器物和文献两类藏品始终并存有关，它们作为展品资料的重要构成，共同经历了展览的五个发展阶段：18世纪中叶以前的简单分类展览；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的科学分类展览；19世纪下半叶的通俗型展览；20世纪上半叶的标准化运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无橱窗化趋向^②。若将其进一步抽象，还可概括为三阶段：物的简单展示阶段、物相关知识的传播阶段及强调观众的意义建构阶段。以古代博物馆雏形——亚历山大博物院（*Museion of Alexandria*）为例，这家公元前3世纪的博物馆不仅收藏有冥想者雕像、天文和外科仪器、象鼻和兽皮等，还收藏有莎草纸手稿（书卷）和亚历山大大帝收集的很多书籍^③。正是由于两类藏品长期被共同纳入收藏体系，所以当我们在策划展览时，也易于忽视对两类展品阐释的异同进行叩问与探究。同时，随着图书馆、档案馆和方志馆展览的问世，虽然文献展览作为现象级产品得以关注，但这些机构更多的是主张与博物馆积极合作，或者干脆模仿博物馆器物展览的策展理念与方法，而未从根本上厘清此类展览的内涵及其相较于其他类型展览的特殊性。通过文献梳理和案例分析，我们发现国际上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的合作实践，始于20世纪80年代，相关政策和专业机构包括有2008年国际图联发布的“公共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合作趋势”（*Public Libraries Archives and Museums: Trends in Collaboration and Cooperation*）^④。2000年，英国专设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理事会（*Museums, Libraries and Archives Council*，

① 陆建松：《博物馆展览策划理念与实务》页11，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

② 黄洋、陈红京：《博物馆陈列展览设计十讲》页19—39，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年；前揭乔治·埃里斯·博寇《新博物馆学手册》，页129—165。

③ [美]爱德华·P·亚历山大、玛丽·亚历山大（陈双双译，陈建明主编）：《博物馆变迁：博物馆历史与功能读本》页4，译林出版社，2014年。

④ 卢家利：《欧美国家公共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合作案例述评——有关国际图联的研究之八》，《浙情报探索》2012年第5期，页44-46。

简称MLA), 尽管后来该理事会会被撤销, 但其职能却被移交至英格兰艺术委员会(Arts Council England, 简称ACE)和英国国家档案馆(The National Archives, 简称TNA)⁴¹; 1996年, 美国成立美国博物馆和图书馆服务管理署(Institute of Museum and Library Services)⁴²; 1989年, 日本设立艺术文献协会(Japan Art Documentation Society)⁴³。尽管这些政策和机构推动了图书馆、档案馆借鉴博物馆成功经验并广泛开展合作, 但却同时导致文献展览一直处于模仿学习阶段, 而未真正步入探索自我、甚至各显千秋的阶段。

(三) 文献展览领域专业化探索的失衡

从横向的现实切面来看, 国外文献展览在21世纪的近几十年中, 开始步入聚焦于专业层面的深化研究阶段。而这条专业化的探索之路, 西方大致可追溯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 而我国基本始于20世纪50年代, 由此诞生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旨在解决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策展共性问题的两本专著——《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举办展览手册》⁴⁴和《图书馆、档案馆和博物馆创建成功网上展览的指南》⁴⁵, 它们分别为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实体和网上展览的成功策划构建出一套理论和标准化做法。前者成书于2014年, 是由泰特美术馆(Tate Galleries)前藏品负责人弗雷达·马塔萨(Freda Matassa)撰写, 除了本书, 她还曾先后完成其他的两本著作——《评估你的藏品》(Valuing Your Collection)、《博物馆藏品管理》(Museum Collection Management), 这三本书构成了一个系列, 专门服务于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相关人员。其中, 《博物馆、图书馆和档案馆举办展览手册》作为此系列中的最后一本, 是有关如何创建和组织成功展览的实用手册, 全书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涵盖了策展的十个关键阶段: 从构思、计划、组织, 到闭幕、巡展和归档。第二部分提供展览组织方面的具体建议和参考资料, 是对第一部分的信息补充。此外, 本书还列举了策展成功的十大技巧和常见的十大错误。后者是由史密森博物院图书馆(Smithsonian Institution Libraries, 又被译作史密森尼博物院图书馆、史密森学会图书馆)承担数字项目的馆员马丁·卡尔法托维奇(Martin R. Kalfatovic)在2002年撰写而成, 集中于探讨网上展览该如何策展的问题。马丁·卡尔法托维奇曾在美国率先推出过几场精彩的网上展览, 所以该书主要论述的是策划网上展览的各个阶段, 可采取的有效方法及其相关见解。本书可提供没有经验、拥有初步经验的同仁或相关人士在策划网上展览时参考。除了两本专著外, 以文献展览作为对象的相关研究,

41 阎琳:《国外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合作现状》,《山东图书馆学刊》2015年第4期, 页79—80。

42 Allen N, Bishoff L, "Collaborative Digitization: Libraries and Museums Working Together", *Advances in Librarianship*, 2002, 26: 43-81.

43 前揭阎琳《国外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合作现状》。

44 Matassa F, *Organizing Exhibitions: A Handbook for Museums, Libraries, and Archives*, London: Facet Publishing, 2014.

45 Martin R K, *Creating a Winning Online Exhibition: A Guide for Libraries, Archives, and Museums*, Chicago: 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 2002.

还包括信息传播(Edina Zsupán, 2019^{〔1〕})、展示手段(如多媒体和互动展示Batt, 1993^{〔2〕}), 甚至是策展理论(Kramer, 2000^{〔3〕}; Anne Hickling-Hudson, 2020^{〔4〕})等方面内容。从上述研究成果中, 我们不难发现: 文献展览领域的专业化研究, 多为围绕该类型展览的策展方法展开讨论, 而对于究竟什么是文献展览, 以及相较于其他传统的展览类型, 该类型展览的基本属性、策展理念和阐释模式等并未涉及。由此反映出本领域相关研究的理论失衡, 呈现出研究中的片面孤立, 而非全面整体, 即在没有弄清研究对象本身的前提下, 而遽论方法层面的问题, 导致文献展览专业化研究的“瘸腿”现象。

三 器物展品与文献展品的属性比较

器物展品和文献展品的属性差异, 主要表现为信息的特征和载体的类别上, 两者截然不同。首先, 在信息的特征上, 器物展品本身拥有传播能力, 所载信息多为显性信息, 如造型、颜色、纹饰, 观众在参观时通过视觉观察, 便能直接获取这些物化信息, 并为这些真实且唯一的信息所吸引和动容。而文献展品则不然, 传播信息依靠的是记录在册的语词符号, 而这些符号多为隐性信息, 只有通过阅读才能被接收, 而非是直观生动的显性信息。如将太阳神鸟金饰、司母戊鼎等器物展品与《新唐书》《华阳国志》等文献展品同时呈现时, 前者会因为器物信息外显, 易于吸引大量受众的驻足观察, 而后者会则因为采用符号化信息, 以及书写表达的时代变迁, 带来短时间阅读困难, 导致吸引力不足。其次, 在载体类别上, 器物信息的物质载体是三维实物, 而文献信息的物质载体是纸质媒介。前者表层信息丰富且千差万别; 而后者表层信息单一, 多采用纸张, 外观、材质、表达都极为相似。因此, 以器物作为对象或材料进行策展时, 优点是信息直观, 载体多样, 审美品质较高, 具备吸引力。缺点是信息层次多, 尤其是内在信息, 难以不言自明和不研自明; 遗留至今的器物通常带着极大的偶然性, 因而不太系统。而以文献作为材料进行策展时, 缺点是信息不直观, 载体同质性强, 容易加速疲劳。而优点是除非遭遇自然灾害和重大事件, 文献的收藏和保存通常完整且有序。同时, 文献展现的是由人类智慧所构筑起的文明世界, 研究者与当时的书写者都以汉字为基础, 采用相通的语言逻辑和表达手法, 所以相较于物的“透物见人”, 这些材料的研究难度相对较低。可见, 文献展览在阐释材料的丰度和材料研究的难度上具备与生俱来的

〔1〕 Zsupán E, Gazdag M, “Information Transfer in a Scholarly Exhibition: The Corvina Library and the Buda Workshop, Budapest, National Széchényi Library, 6 November 2018–10 February 2019”, *Alexandria: The Journal of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Issues*, 2019, 29(1-2): 30-58.

〔2〕 Batt C, “Multimedia and Interactive Display in Museums, Exhibitions and Libraries-Hoffos, S”, *Journal of Documentation*, 1993, 49(3): 333-335.

〔3〕 Kramer M, “Public Record Office Exhibitions (British Archival Records)”, *Magazine Antiques*, 2000, 158(1): 36.

〔4〕 Hickling-Hudson A, Hepple E, “Crossing the Boundaries of Imagination: The Role of a Public Library Exhibition in Global Learning for Student Teachers and Teacher Educators”, *Teaching and Teacher Education*, 2020, 90: 1-10.

优势，此为文献展览提炼特色主题，进行完整阐释创造了良好条件。

四 器物展览与文献展览的策展理念比较

器物展品与文献展品之间存在着本质差异，因此基于这两类展品所策划的展览，理应具备两套截然不同的策展理念。为此，需要从思维定势上打破潜意识中的三点陈见。

陈见一：器物展品和文献展品的传播重点并无差异。但是，事实上两者在传播上应各有侧重。器物展品拥有物质外壳和内载信息，而文献展品实质上只拥有语词符号信息。因此前者是信息和载体的统一体，而后的信息和载体却可以剥离。所以，虽然文献也属于一种物证，但是其物化载体在信息传播上几乎没有太大意义。因此，如果器物展览是依托信息和载体进行传播，那么文献展览只需要依托信息，而非载体。如果文献展览像器物展览一样，直接将载体用以展示，那么文献的传播价值将大打折扣，因为记录在载体上的语词符号即便和载体一同被展出，但由于这些符号多为隐性信息，仍未转化成可视化表达，所以观众难以快速直接获取，其传播效果也必将差强人意。

陈见二：在构建完整主题时，器物展览和文献展览一样困难。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因为相较于文献展览，器物展览的展品资料基本是七零八落或残缺不全的，留存至今的各类器物带有偶然性和非均质性。尤其是在自然界或人类社会早期，受到物件材质、随葬观念、保存环境等因素影响。即使是被有幸保存的实物，也未必能被有幸发现，被发现的也未必能进入博物馆^{〔1〕}。因此，器物展览立足的是碎片化的物证，即有什么展什么，这些先天不足的展品资料必然会给器物展览的主题遴选和系统阐释带来一定的困扰。而这一点在文献展览中并不凸显，因为若不是遭遇严重的自然、战争或其他不能预见的不可抗力，文献藏品通常完整而系统。这些丰富的文献资料将为创建出个性化和整体性兼具的展览奠定材料基础。

陈见三：器物展览和文献展览的信息编码过程大体相同。但是，事实上两者迥乎不同。器物展览中展品是信息物化的产物，需要借助考古学家、地质学和历史学等科学不断优化理论和方法，以提炼出器物所携带的各类信息，尔后通过语词符号进行科学解释，最终遵循观众的认知特点和学习方式实现研究成果的再物化。而文献展览中的展品则不同，大部分材料都是文字信息，基本是对人类思想和行为的直接记录或说明。可见，文献展品是语言锁定的，与相关研究者的语言系统基本一致，具备明确时代、特定人或物。所以文献资料再符号化的过程（即通过文献研究来撰写相关论著），虽然也会因手稿书写潦草、缺乏句读等问题遭遇研究困难，但相较于器物研究，其无论是学科综合上，还是证据支撑上，难度显然更小。因为器物研究需要通过物“见人、见精神”，即借助实物来探索人的发展史（环境、人口、生计和社会结构变迁等），而在这一过程中，需要研究者提出问题、假设结论，设计方法、寻找数据/证据，尔后

〔1〕 周婧景：《博物馆现象的内在逻辑及其研究价值初探——从〈博物馆策展〉一书谈起》，《博物馆管理》2020年第2期，页54。

进行数据分析和呈现，并展开讨论和总结。所以整体而言，“针对文献的研究”相较于“针对器物的研究”更加易于实现，这也说明在策划展览时，相较于器物展览，文献展览学术支撑资料的产出相对难度更低，以便为后续的展览阐释奠定内容基础。

综上，器物展览在“展品传播重点、构建完整主题和信息编码过程”上与文献展览大相径庭，因此文献展览应当重构一套有别于博物馆器物展览的策展理念。通过两类展品的属性比较和三大陈见的相继澄清，笔者认为器物展览和文献展览的本质差异在于：是否需要进行信息重构。器物展览中信息重构并非必须，既可以重构物载信息，也可以直接呈现器物。但文献展览必须重构文献信息，这一点和科学中心类似，并使之可视化，否则文献的缺点将会凸显，优点可能丧失，提高文献利用率和改善信息服务的初衷也难以达成。因此，当孙中山革命纪念馆将中华民国的档案布满一面展墙时，观众很少会停下脚步、悉心阅读，其传播收效常常微乎其微。而在文献展览中，即便要采取直接呈现的传播方式，也只能处于辅助地位，万万不可成为主导方式。

随着本文将文献展览独立出来，以及尝试将其属性、理念等方面进行廓清，有三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要将文献中的图像与文字区别开来，图像本身是一种视觉传达，形式即内容，所以可直接呈现，我们所说的不宜直接呈现的是文字，文字的形式并不等同于内容，其需要转化后再予以呈现。二是有人可能会提出这样的质疑，信息重构可能会破坏文献的真实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文献的真实性并不等同于载体必须真实。笔者虽然不主张将文献直接用以展示，但倡导将文献中的真实信息经由重构进行物化阐释，笔者认为始终需要坚持的是文献所载信息的真实性。三是在为文献展览重构信息时，需要从当下语境出发寻找与人们之间的关联，从而使这些经由重构的信息对今人而言具备当代意义。因为话语往往依附于语境，语境对话语具备很强的制约性。正如苏珊·皮尔斯(Susan M.Pearce)所言：“只有话语之间建立联系，才能让这个符号被人们接受，而且是有效的。但问题在于话语会演变，这导致符号本身也在演变，改变其意义。”^①因此，即便是同一批文献，在不同时代进行策展，其最佳的主题、内容和形式可能都会改变，信息重构将受制于流动的历史和变迁的社会。文献中的符号化信息通过再语境化，最终转化为可感知的现象，这个由现象所构成的世界，与我们的现实世界是同构的，两者都是基于物、人和空间^②。因此，立足当代语境再造的展览时空及其故事，对观众来说是易于介入并可能被理解的。

可见，正是由于器物展览和文献展览存着本质差异，所以应使两者保持边界清晰、各有侧重，而不是将器物展览“文献化”，或文献展览“器物化”。器物展览就是器物展览，文献展览就是文献展览。不能将任何类型的展览都转化成通史式的百科全书展，也不能一味追求展示材料的盲目拓展，而应致力于不同展览类型的精耕细作。在好大喜功的心态驱使下，当前一部分文献展览中展品资料的范围正在日益扩

① 国际博物馆协会博物馆学专委会主席弗朗索瓦·梅来斯(François Mairesse)《博物馆学：历史与基础》(Museology: history and foundations)授课内容。

② 李德庚：《当代博物馆展览的叙事设计结构研究》页46，清华大学，2018年。

大，但深度上却始终原地踏步。如某图书馆在征集藏品时不再专注于古籍善本，而是大量入藏陶瓷、青铜和玉器。事实上，展示材料在广度上的无限拓展将会造成越位或错位，但深度提升却能发掘其自身的资源优势，成就独一无二的个性展览。总体而言，器物展览和文献展览在策展理念上是完全不同的，文献展览不可“邯郸学步”，不假思索地效仿博物馆器物展览的策展理念，而应坚持“走载体和信息相分离的道路，致力于信息重构后的物化表达”。否则文献展览一旦“盲目效颦”，将会使器物展览和文献展览趋同，造成已独立出来的文献展览，作为文献资源创新利用的一种媒介，因为阐释理念的定位混淆或不当，而导致无法物尽其用，最终使这类独特展览之既有价值流失。

五 器物展览与文献展览的阐释模式比较

我们知道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已创造并留下了丰厚的物质遗存和精神遗存。这两类遗存既有以物为载体的，也有以人为载体的。其中，以物为载体的，又可以分为两类：被创造出的物，被记录下的符号。后者是人类的主动行为；而前者却有所不同，主体可能是人，也可能是自然界，可能是主动行为，亦可能是被动行为。被记录下的符号，不同于被创造的物，代表的是人类过往的文明，为人类思想的产物。为此，我们需要针对文献展览和器物展览，分别构建一套展览的阐释模式，以提供给博物馆、图书馆、档案馆和方志馆等相关组织参考使用，并用以探究两类“物证”从反映外部世界到经博物馆化，再加以利用的信息编码过程。

器物展览和文献展览的阐释模式都主要囊括四个阶段，其中第一、第二阶段较为类似，而第三、四阶段则存在显著差异。第一阶段分别为“从信源到器物”/“从信源到文献”，无论是器物还是文献，都是当时世界的信息遗存。其中器物包括三类：纯审美的物、纯实用的物，审美和实用兼具的物。前者主要为观看而生，所以可以直接用于展示，而后两者并非为观看而生，所以一旦进入公共空间后需要进行阐释，否则观众将一头雾水。文献也包括两类：有意传播的文献、无意传播的文献。前者如图书善本，本为传播而撰写，后者如各类档案，其撰写并非为了传播，而只是用作记录。因此，后者阐释的难度相对更大，但通常更加纪实。

第二阶段分别为“针对器物的研究”/“针对文献的研究”，器物研究是指将器物的表层和内在信息逐层剥离，加以研究；文献研究则是指将信息与载体分离，围绕信息展开当代人视域下的解读、转化和表达。无论是针对器物，还是文献，不能仅限于获取描述、分类、断代等识别信息，而是应致力于获取与人或事相关，且服务于展览的媒介信息。同时，为了相关研究能全面而深入，要依赖跨学科、跨领域、跨工种合作的研究人员。此外，只是研究器物或文献本身已不足够，还要研究作为对象的观众和作为桥梁的传播技术，以及将观众、器物（文献）、技术相融合的阐释系统。

第三阶段分别为“器物的再语境化”/“文献的信息重构”。正如前文所述器物由于类型不同，拥有不同的阐释需求，所以“器物的再语境化”主要包括三种情况：一是直接呈现，这种再语境化最为简单，只需

对器物进行分类，使其在一定分类框架下直接展示。二是具备主题、器物先行的再语境化，深入挖掘器物及其所载信息，提炼主题并通过故事线进行信息编码。三是具备主题、理念先行的再语境化，先确定主题，再通过购买、捐赠、借贷等方式获取展品，通过展品及其所载信息实现主题阐释，如加拿大人权博物馆展览、美国失恋博物馆展览等。而“文献的信息重构”是指在文献解读的基础上，通过挖掘文献所载信息，提炼主题和故事线以实现信息重构。

第四阶段为最后阶段，分别是“器物与相关现象的物化呈现”/“文献信息中相关现象的物化呈现”。“物化呈现”主要是指特定展览空间内，展览元素及其环境的形式表达。“器物与相关现象的物化呈现”中，器物展览的形式表达通常由三大层次构成，它们分别是核心层次、中间层次和外围层次。核心层次是第一层次，该层次展示的是器物 and 器物组合等展品资料；中间层次是第二层次，处于核心层次的周围，通常会安排人工制成的景观或模型，配合介绍相关背景或说明相关原理，其往往具有自我表达的能力；外围层次是第三层次，主要是色彩、灯光等背景处理，它们本身通常不进行自我表达，只起到烘托氛围以引起观众注意或加深理解的作用^①。而“文献信息中相关现象的物化呈现”是指文献信息经过信息重构后实现可视化表达。实物呈现并非文献展览的主要传播方式，策展人应根据展览主题和内容，打造出与它们的基调相匹配的展厅氛围，并主要采用辅助展品，如借助造型、媒体和装置等生动实现文献信息的物化表达，从而使观众能更好地理解，并主动参与至文献内容之中。一场优质的文献展览绝不能大量采用文献直接进行展示，而是要在信息重构的基础上实现二次转化和表达，应大量借助各类型的辅助展品和多样化的展示手段，如果直接展示文献，展览的阐释性和体验感将会被大大削弱。

“文献信息中相关现象的物化呈现”通常存在两种情况：一是对文献所载信息进行编码后转化而成的实体展览，二是对文献编撰过程及其使用技术和工具进行阐释后转换而成的实体展览。前者是文献展览中的重中之重，因为此类展览有助于发掘馆藏文献的核心信息及珍贵价值。而后者虽然在重要程度及其所处地位上不及前者，但也彰显出文献本身蕴含的非物质价值，这类展览通常包含着观众不太了解并深感好奇的过程性信息，有助于观众认知非遗传承及其展现的匠人精神。所以，面对文献展览，策展人进行物化呈现时实际存在两种思路：一种是将文献所载信息进行物化，另一种是将文献编撰过程及相关信息进行物化。此外需要注意的是，文献展览展示的实物多为纸质文物。这类文物通常相对脆弱，对光照、空气和温湿度等都存在严苛要求，因此保证它们的安全是展览物化呈现的首要前提。可通过安装温度计和湿度计，创建用以展示的小环境，有效监控环境，定期更换展品，购买空气调节或过滤系统等方法加以缓解或解决。

通过上述四个阶段我们可以发现物证(器物或文献)，作为揭示其所在世界的一种媒介，能为我们再现那个远去的自然或社会。在此之前，有关器物或文献的研究，本来只是为少数研究者或爱好者所共享，但是当我们以两类物证及其所载信息为依托，打造出一个相对客观的物化世界时，它已经不再是个

① 前揭严建强《博物馆的理论与实践》，页270。

体化信息而成为一个信息共享体。借助一批有关联的器物或高质量的文献创建一个成功的展览，说到底，这是为了达成人类世界内部，或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一场跨时空对话，使最初的信源最终转变成特定空间内的信息共享体，促使观众在获得真实的感知和理解之余，能启迪人心并烙下印记。

六 讨论与反思

展览是博物馆传统且核心的业务，它使得博物馆体验区别于其他的文化和教育体验。尽管博物馆的角色、对象和功能在不断地被拓展和创新，物依然是观众走进博物馆的关键原因^①。“真实的物”作为一种“物化记忆”(Materialised Memories)的价值不能被低估，观众希望同物之间产生独一无二的关联，这样的体验只有在展览环境中才能被获取^②。展览的独特性也正是在于对“真实的物”的运用^③。

然而，“真实的物”本身是包罗万象的，器物无疑是其中的主打展品，所以长期以来，器物展览成为展览研究的重要对象。这一点无可厚非。但事实上，除了能被感知的器物外，“真实的物”中还存在能被识读的文献，它们与器物一样，珍藏着民族鲜为人知的记忆与智慧，是民族成长和发展的全面反映，流传至今和保存修复都极其不易，是我们不容忽视的一类独特产品或印记。但文献之所以被收藏并非是因为载体本身，而是由于载体所负载的信息。这些信息是文献的核心价值所在，它连接着无机和有机世界，揭示着各时代的人事关系。然而颇为遗憾的是，如今大量文献仍躺在图书馆、档案馆、方志馆和博物馆等的角落里布满灰尘无人问津，或被封存于书库不见天日。即便它们被当作“共器”拿出来使用，但由于年代久远，多数普通受众已无法轻松识读，对他们而言犹如天书，难以自明。

这一背景下，文献展览作为一种展览类型，在20世纪20年代后异军突起^④。近年来，展览成了文献收藏机构信息利用和创新服务的一大亮点，以其视觉化、生动性和体验感等特点吸引了广大受众，逐步发展成为其核心业务并呈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⑤。在图书馆领域，首个展览——图书展览会诞生于1929年。2003年，文化部社会文化图书馆司规定把公共图书馆的展览活动纳入“全国省级公共图书馆评估标准”^⑥；档案馆领域，自90年代开始，档案展览的数量与日俱增，尤其是在2005年后，数量急剧攀升，各级各类档案馆先后获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目前文献展览之所以广受推崇，本意是为了提升文献信息的利用率。19世纪末20世纪初，时任美

① Lord B, Piacente M, *Manual of Museum Exhibitions*, 2nd ed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14: 195-212.

② 同上。

③ Dean D, *Museum Exhibi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p.3.

④ 王致翔：《国家图书馆早期(1929—1936)举办的文献展览》，《国家图书馆学刊》2005年第2期，页80。

⑤ 周婧景：《文献收藏机构的展览研究综述——博物馆学关联性研究的引入和影响》，《自然科学博物馆研究》2019年第6期，页36。

⑥ 张婉莹：《服务拓展与文化引领——河南省少年儿童图书馆展览的实践与创新》，《河南图书馆学刊》2018年第5期，页138。

国图书馆协会主席的约翰·科顿·达纳(John Cotton Dana)曾提出在当时看来振聋发聩的主张,“所谓一本好书,是一本用旧的书,就是一本被很多人用过的书。一本书没有磨损,意味着这本书没有被人阅读,就是没有意思”^{〔1〕}。文献是否被利用及其利用程度,成为评判文献价值的重要标准。只有当文献从内容而非形式上被利用时,文献本身才算是真正得以“重见天日”。但事与愿违的是,在不少文献展览中,策展人只是将文献直接作为展示对象,或者将文献作为物证点缀其中,该做法在提升文献信息的利用率上往往徒劳无益。文献真实性和唯一性的属性固然重要,但其真正价值并非于此,机构即便宣告了它拥有这些真实而唯一的物证,但仅此而已,观众在欣赏完文献后,可能对所载信息依然一无所知。因为多数观众在展厅中并不乐意阅读大量的立体教科书;即便有阅读意愿,通常也会因书写习惯、字体识别等技术与方法上的障碍而难以持久。这种方式并不适合观众的空间体验式学习,其结果将会导致信息大量流失,而这些信息才是文献的价值所在。因此,文献展览必须在研究文献的基础上进行信息重构,此乃提升文献信息利用率的唯一举措,否则文献展览被引入和推广的意义必将大打折扣。由此可见,不假思索地将器物展览的策展理念和做法运用至文献展览,实际是很可笑的,将带来的结果可能是文献策展的创新之举劳而无功。因此,需要将器物展览和文献展览进行分类,并于此基础上展开深入研究。

现今文献展览的策展实践,由于深受器物展览的惯性思维影响,尽管耗资巨大,但不少却变成了将文献挂在墙面的陈列馆。同时在策展研究中,更多倡导的是工具理性,热衷于探讨经验层面如何进行实操,这虽然也很重要,但只是一种片面的理性。价值理性告诉我们应当去探究对象本身的特殊性以及这样的判断是如何获得的。文献展品的真正价值及其特点决定了文献展览并不等同于器物展览。实际上,器物展览和文献展览代表的是展览的两个极端,从实物导向的极端,到信息导向的极端。大卫·迪恩(David Dean)根据费哈尔(Verhaar)和米特(Meeter)的项目模型展览(Project Model Exhibitions)修改而成的模型,便说明了这一点〔图一〕^{〔2〕}。实物导向型展览,纯粹是出于实物的考虑而展示实物,注重的是采用直接美学或分类方法进行展示,目的是使实物具备吸引力,靠自己说话,展览只是提供基本信息,如名称、时间和材质等^{〔3〕}。信息导向型展览,聚焦于信息和信息传递,而并非展品本身,其重视展览主题的选择、展览结构的安排、展示内容的组织和视觉形象的表达,属于一种教育展览^{〔4〕}。

可见,在探索展览专业化的过程中,不可一味专注于方法论层面的问题,而是要先讨论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在分类研究的基础上探寻展览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坚持差异性前提下的方法论探索,只有这样才能为“展览”——这一特殊媒介真正步入专业化奠定基础 and 创造可能。我们期待文献展览能走出一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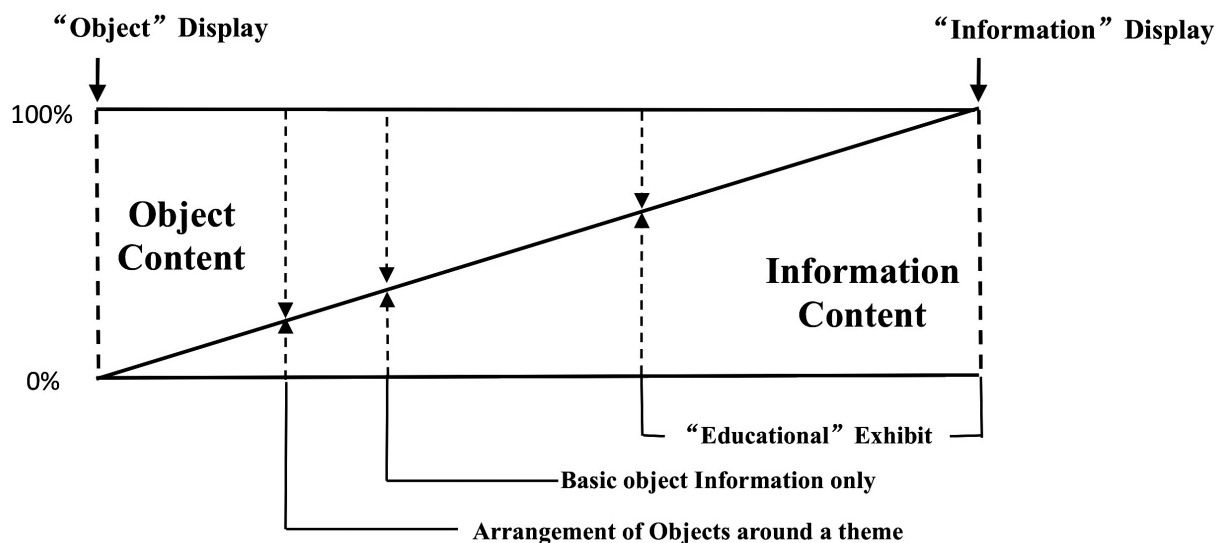
〔1〕 前揭[美]爱德华·P·亚历山大、玛丽·亚历山大(陈双双译,陈建明主编)《博物馆大师:他们的博物馆和他们的影响》,页323—324。

〔2〕 Dean D, *Museum Exhibi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p.3-5.

〔3〕 Dean D, *Museum Exhibi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p.4-5.

〔4〕 Dean D, *Museum Exhibi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p.4.

〔图一〕展览的两种极端类型^{〔1〕}



与器物展览区别发展的道路，未来可以为观众打造出不同于器物展览的专业展览，以亲近世人的方式为他们利用文献降低门槛，使观众无须经历古籍世界的清冷和潜心书海的艰辛。因为策展人已将历史的尘埃轻轻拂去，使文献信息中的生动故事在展览空间中得以真实再现，并以此丰盈和滋养每位前来观展与探寻之士的人生及其精神。

〔作者单位：周婧景，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马梦媛，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张 露）

〔1〕 Vahaar J, Meeter H, *Project Model Exhibitions*, Holland: Reinwardt Academie, 1989: 4.